

20世纪俄罗斯 档案文件

新经济政策
是怎样被断送的

(三)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

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五卷本）

- 第一卷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二卷 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三卷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四卷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五卷 1929年11月10—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三卷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1928—1929 г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терик»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Фонд Александра Н. Яковлева), 2000.

© Данилов В. П., Закомолкина И. М., Леванович В. С., Хлевнюк О.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本书中文版权取得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授权,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07-0782号

责任编辑:崔继新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马 杰 责任校对: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三)/[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曲延明

任建华等译 赵国顺 李京洲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2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主编)

ISBN 978-7-01-006259-4

I. 新… II. ①雅… ②曲… III. 经济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F1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606 号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三)

XIN JINGJI ZHENGCE SHI ZENYANG BEI DUANSONG DE

[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曲延明 任建华等译 赵国顺 李京洲 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5.5

字数:763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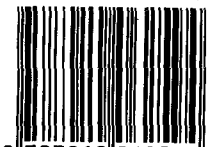
ISBN 978-7-01-006259-4 定价:9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部发行)

ISBN 978-7-01-006259-4



9 787010 062594 >

本卷编辑出版委员会:

В. П. 丹尼洛夫 О. В. 赫列夫纽克 А. Ю. 瓦特林 (以上为主编)

М. С. 阿斯塔霍娃 Г. В. 戈尔斯卡娅 И. М. 扎科莫尔基娜

Е. Е. 基里洛娃 Л. П. 科舍廖娃 В. С. 列瓦诺维奇

Л. Н. 马拉申科 Н. В. 穆拉维约娃 Л. А. 罗戈娃娅

Н. А. 西多罗夫

曲延明 任建华 邢艳琦 刘燕明 门三姗

韩 英 侯静娜 彭晓宇 付 哲 译

赵国顺 李京洲 校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翻译出版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主任：戴秉国、李慎明、李静杰（常务）

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钊贤	王钢华	乌传袞	冯育民	李方仲	李京洲
李慎明	李静杰	汪 宁	郇中建	张达楠	赵永穆
赵仲元	赵国顺	徐 葵	黄书元	鲁 桓	戴秉国
魏 华	臧乐安				

卷 首 语

《20 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是迄今为止,俄罗斯整理出版的规模最大的历史文献集。收录的大部分文献,都是首次对外公布,内容贯穿俄罗斯 20 世纪特别是整个苏联时期的历史,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史料价值极高。

2001 年春,我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同志向我建议翻译出版此书,我表示赞成,并担任了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六载寒暑一挥间,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人民出版社及翻译出版委员会的同志,为本书的按期译成出版,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的译者,多为我国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正是他们经年的认真严谨工作,才使我们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了解这部文献的内容。在此,我对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崇高的敬意!

苏联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史;是人类第一次探索、寻求自身解放,实现人民国家的历史;是人类的极为宝贵的经验、史诗。人类这部遗产必须记取,并深入反复研究。

十月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响亮的一声号角,洞开了人类的眼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当然,这个历史探索是充满曲折、艰难、复杂,甚至严重的挫折或一时的失败。苏联在建立后 69 年解体了,倒下去了,但历史永存、精神永存!道不亡,理不失,历史将按自己的规律、道路走下去。潺潺细流,终将千回万转夺路归大海,这是自然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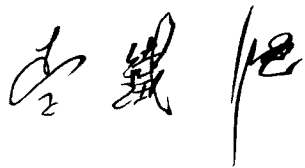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研究历史资料,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拔高一寸,不贬低一分,不涂抹一笔,不杜撰一字。只有这样,才能继承这笔精神遗产,把苏联史作为当代史来研究。

中国是史学大国,《史记》、《资治通鉴》等都是其经典著作。这些史学巨著为中华民族的传承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脉络渊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目的都是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发展的伟大探索。在这一历史探索过程中,汲取人类的历史遗产,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是必须的,也是走向未来的历史起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善学善为者史存焉!

史料是人类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基础。这部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文献集,将为我国对俄罗斯特别是苏联历史的研究提供大量新鲜史料。但是,任何史料都会因编者的立场观点而存在局限性和倾向性,因此,在使用这些文献资料时,要对之加以分析和鉴别。

我建议这部史学巨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斯为馨香以祝之!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stylized characters: '李', '锐', and '记'.

2007 年 9 月 30 日

序

1928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

斯大林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在联共(布)中央 1928 年七月全会(此次全会的速记记录发表在上一卷中)上公开暴露出来,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政治局内的斗争具有“稳扎稳打”的性质,其表现主要与当时的事件有关。对立双方唯恐被人视作分裂制造者,言行极为谨慎,此外,因适逢夏季休假期而出现的通常的季节性平静,也起了作用。

1928 年 7 月 10 日通过的关于停止执行“非常措施”和纠正其造成的“缺点和错误”的决定,本应能够防止今后采取“任何非常措施”¹,从而保证不仅在国家和农村的关系上,而且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恢复新经济政策的各项原则。但是,上述决定的实施一拖再拖,从一开始就具有空话宣言的性质,并且局限在与所谓的“过火和歪曲行为”作斗争的范围之内。斯大林领导班子对于刚刚通过的中央全会(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决定,实际上采取了暗中抵制的立场。

七月全会以后有关取消“非常措施”的中央政权机关文件,反映了上层支持和反对恢复新经济政策的人之间的明争暗斗。7 月 16 日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下发了第 23/c 号秘密通知,通知中从“先前发布的有关粮食收购的命令”出发,责成检察院采取“坚决措施,立即从粮食收购运动的实践中消除有害的(?)过火行为”,如对农户的盘查、“非法的搜查和逮捕”、义务上缴“余粮”的余粮收集制、关闭集市等行为;通知命令搜集“有关地方政权机关采取类似措施的一切事件的”信息,并且“通过提出异议……争取立即取消这种措施”,若出现对异议的不满,要向上级检察机关、“直至共和国检察长”报告,甚至要追究“进行这种歪曲者”的刑事责任。

责成检察院和法院随后“立即按照上诉程序和监督程序审查所有与《刑法

典》第 107 条有关的未审案件,终止涉及中农和贫农的一切案件”,同时要遵循曾在“非常措施”条件下为筹备中央四月全会而通过的,但在全会之后立即被遗忘的 1928 年 3 月 28 日通知……

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通知中,“为即将到来的粮食收购运动做准备……”用的是不同字体,更加严厉地要求将其作为“检察院和法院的主要任务之一”。命令“……立即召开检察院、法院和侦查机关工作人员的联席会议,并吸收有关机构(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作者注)的代表参加,仔细研究你们地区以往粮食收购运动的结果,为使整个司法侦查机构对以后的运动做好准备而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确保在司法机关的工作中出现必要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内容被笼统地概括为:防止“地方政权机关可能重新采取非常行政措施”、不允许“重新出现对中农和贫农有害的(?)过火行为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随后应该立即十分具体和明确地要求“使侦查机构和司法机构对于迅速审理有关收购和买卖粮食的商人的案件做好准备,因为这些人一旦重新企图……破坏粮食收购,就应该受到《刑法典》第 107 条的追究”。同时命令“坚决打击苏维埃机关纪律涣散的作风和不尽职的行为,坚决打击有害的竞争行为……坚决打击破坏……规定的粮食收购价格的行为等”。最后,强调指出了“这些任务的极端重要性和意义……”“迅速地、一丝不苟地、站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解决这些任务,是对司法机关的强大有力和政治坚定性的考验”²。

对司法人民委员部 1928 年 7 月 16 日秘密通知进行详尽说明,首先是因为这份通知是中央七月全会后下达到地方的第一份具有实际意义的有关粮食收购问题的指导性文件。H. B. 克雷连柯(时任副司法人民委员)签署的这一文件显然是在斯大林的指使下拟就的。

实际上,这不是关于取消“非常措施”和纠正其后果的通知,而是关于保持和继续实行紧急措施的通知,但把执行者改成了惩罚机构——检察院、法院等。中央全会的决定在一段时间内使斯大林领导班子无法大肆利用党的组织系统推行强制性的粮食收购政策,无法大规模地采取非常措施。

苏联人民委员会于 7 月 19 日即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第 23/c 号通知下发三天之后通过的《关于收购新收谷物的决定》,是对斯大林的变相指示的回应。A. И. 李可夫领导的政府作出决定:“1. 禁止采取任何形式的非常措施,要求所有政权机关做到:(1)立即停止使用强制没收农民粮食的一切(!)手段,包括不再‘追究迟迟不向市场出卖粮食者的法律责任……’即不再适用《刑法典》第 107 条;(2)立即停止一切禁止集市贸易和农村内部流转的措施……2. 根据

地方条件将粮食收购价格每普特提高 10—20 戈比。”

当然,这仍低于市场价格,但能为恢复城乡之间的等价交换奠定基础。政府要求商业人民委员部“保证向农民及时合理地供应工业品……”(第 3 条),并且要求所有政权机关“对手工酿酒进行更坚决的打击”(第 4 条)³。

总的来看,《刑法典》第 107 条,特别是因这一条被逮捕和被判决有罪者的命运,是统治集团中久拖未决的最大分歧。如我们所看到的,司法人民委员部 7 月 16 日的通知只是要求通过审查“一切尚未审结的案件”和终止中农和贫农受到追究的案件来纠正适用该条刑法所造成的后果。在今后时期则要求司法侦查机构“在重新出现破坏粮食收购的企图……时”作好“迅速”适用《刑法典》第 107 条的准备。苏联人民委员会 7 月 19 日的决定实际上禁止适用第 107 条。

问题直到 8 月 2 日才得到解决,当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释放根据《刑法典》第 107 条而被判有罪的贫农和中农以及今后在进行粮食收购时不采取非常措施的决定。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新通知(8 月 7 日第 26/c 号)是高层冲突双方妥协的最终结果,这一通知不是在司法机关的整个系统内分发(像 7 月 16 日的通知那样),而是在省、州和边疆区的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的有限范围内分发。终于发布了命令:“立即释放因没有上交余粮而根据《刑法典》第 107 条通过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程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被判决有罪的中农和贫农。应当注意的是,此项措施不适用于怙恶不悛的囤积居奇者和粮食投机商;富农和私商”。同时要求“立即终止所有根据《刑法典》第 107 条而追究没有上交余粮的中农和贫农责任的未审结案件”。

在新的粮食收购运动中,“根据政府 1928 年 7 月 19 日的决定,作为对我们 1928 年 7 月 16 日第 23/c 号通知的补充”,提出如下要求:

“(1)以适当的方式坚决制止一切可能的重新取消集市和农村内部流转、设置阻截队、强迫把粮食送往集市的农民把粮食出售给国家或者合作社机构等的做法;

“(2)绝不能容许以强制方式收缴农民的粮食,比如:盘查农户、搜查、余粮收集制;非法的和不合诉讼程序的逮捕;按照诉讼程序或者非诉讼程序追究没有把余粮上缴或者没有把余粮投放市场的农民的刑事责任。

“(3)与此同时,必须按照司法人民委员部 1928 年 7 月 16 日第 23/c 号通知第 3 条的指示,全面加强对手工酿酒的打击”⁴。

反对“非常措施”的人似乎取得了胜利,似乎实现了禁止对农户适用第 107 条的目的。但司法人民委员部 7 月 16 日的通知只是被加以补充,而不是被取

消,并且不久之后的粮食收购正是按照该通知的要求进行的。9月11日《消息报》登载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其中提到对农民“强制没收粮食”的事实。9月15日司法人民委员部下发了新的通知:《打击粮食收购中的破坏行为》(第127号),以此“重申我们1928年7月16日的通知”。8月7日的通知实际被彻底忘在脑后⁵。

1928年7—8月间,斯大林领导班子之所以同意暂时取消“非常措施”,只是在等待恢复紧急措施的时机而已,没有采取任何举动消除“非常措施”的后果和改变已对个体经营的前景失去希望并且把生产压缩到自家生产生活的需要水平的农民的情绪。斯大林在同他的支持者的来往书信中公开表示不接受在政治局内的斗争压力下被迫同意的那些措施。米高扬8月23日致斯大林的信(见补充材料1)和下面援引的斯大林9月17日和26日致米高扬的信表明,新的紧急粮食收购运动只是被推迟,想必由于中央新一次全会临近,于是决定从签订了播种合同、但由于收成不好而无力履行义务的农户来开始新的紧急粮食收购运动。责成根据《刑法典》第131条追究这些农户的责任,这一条刑法规定:“不履行同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签订的合同义务……如果审理案件时……发现不履行义务是恶意的,则判处不少于6个月的监禁并处没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⁶这条法律在惩罚力度方面对第107条是极其重要的补充,并在实践中得到严格执行。在进行1929年的粮食收购时,司法人民委员部责成检察院和法院“特别重视此类案件,保证以最快速度侦查和审结这些案件”,给予“极其严厉的惩罚”⁷。

斯大林在9月17日致信米高扬:“你的便条收到了。看来,粮食问题将提上日程。应当承认,布哈林会失去通过再次提高粮食价格而‘加紧向富农进攻’的机会。你可以对他说,我完全理解甚至同情他的处境。”⁸斯大林在9月26日发展了这个想法:“许多人曾认为取消非常措施和提高粮食价格是消除困难的基础。这是布尔什维克中无聊的自由派的无聊的指望。”⁹

斯大林竭力拖延事件的进程,他行动谨慎,不出头露面,不时有意退到一边。他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在莫斯科郊外秘密召开)上没有讲话¹⁰,尽管他被认为是政治局内的头号中国问题专家。他在7月17日开幕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也一言不发。结果联共(布)代表团委员会在布哈林关于国际局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提纲被作为基础并被提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后,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重新组织了对提纲的讨论。¹¹

7月25日,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作最繁忙的时候,联共(布)代表团听

取了布哈林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根据布哈林简要的笔记来看,他为其战后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资本主义演进中需要重新看待和评价的崭新阶段的观点作了辩护。“我们现在意识到,主要问题还在于我们应该期待资本主义曲线出现下降。如果我们要说外部和内部的原因等等完全缠绕在一起的话,那么主要问题在于整个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相互缠绕并且不能将其与内部矛盾拆分开。”¹²这些思想产生于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一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新的方式提出了民族因素和国际因素在经济演进中的相互关系问题。

得到斯大林支持的 B. B. 洛米纳泽是布哈林的主要论敌。洛米纳泽坚持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日益临近,为此应使各国共产党做好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准备”。布哈林在同他的论战中提到了几乎导致中国共产党人毁灭的盲动主义的危害:“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把中国的党保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在第九次全会上坚决改变了方向……就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而言,其中并不存在盲动主义,但有许多同志说他们因无法完成的起义命令而感到痛苦……人们拿起棍子去举行起义。”¹³

由洛米纳泽提出并经联共(布)代表团同意的大部分意见,意味着“从左的方面”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批评。斯大林也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在7月25日的会议上讲了话。¹⁴结果向外国代表提出了新的提纲方案,壮大起来的“走廊代表大会”立即知晓了该方案出台的情况。这是在公开败坏布哈林的声誉,于是共产国际中,首先是德国共产党中,反对布哈林的人开始公开地说布哈林的末日来了,说布哈林是“去阿拉木图(托洛茨基的流放地)的候选人”。问题被提交政治局,但斯大林在向前迈出两步之后喜欢再向后退一步。7月30日代表大会各代表团代表会议收到一份由政治局委员签署的声明,内容是对散布有关联共(布)领导人之间分歧的流言表示抗议。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结果使斯大林感到十分满意。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加入了关于“右倾”是威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的论点,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 B. M. 莫洛托夫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夏天《真理报》编辑部也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布哈林分子 A. H. 斯列普科夫和 B. H. 阿斯特罗夫被清除出去。

斯大林于8月初去休假,他仔细计算了他现有的用于转向坚决进攻的后备力量,他通过往来书信指挥其在莫斯科的追随者的行动。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写信时特别直言不讳,莫洛托夫身居联共(布)中央书记的要职,有能力控制所有的机构杠杆。在这段时期,无论斯大林还是“右派”,都不仅在团结各自的支

持者,而且在争取那些尚未明确立场、由于各种原因动摇不定的党的工作人员。这些任务在斯大林不在时由莫洛托夫完成。斯大林从南方写给莫洛托夫的最初一封信——1928年8月5日的信中,要求“时刻警惕”,防止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右派”的影响。“在我们周围存在这种家伙——对党不利。不能错过把这些‘活动家’从领导岗位上‘搞掉’的机会。”¹⁵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道密切注意政治局委员的动向,在他们之间挑起矛盾。例如,斯大林在1928年8月23日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写道:“无论如何不能让托姆斯基(或者旁的什么人)使古比雪夫或米高扬‘丢脸’。你能否把托姆斯基攻击古比雪夫的信寄来?”¹⁶斯大林收到需要的托姆斯基的信之后,在8月31日给古比雪夫的信中写道:“你的情况怎样?听说托姆斯基有意和你为难。他是个恶毒的人,不是一向都很老实的。我觉得他是不对的。你的关于合理化的报告我已经读过。报告是恰当的。托姆斯基对你还有什么要求?”¹⁷斯大林在这段日子里给米高扬的信写得相当勤。斯大林在8月28日的长信中安抚米高扬:“我认为,我国的粮食紧缺还将持续两三个星期。之后会好些。大概这是向好的方面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将积存下粮食,年底我们就能有储备了。关键是这两三个星期要挺住,很困难,但要挺住(……)总之,要坚持,别气馁,胜利肯定属于我们。”¹⁸斯大林的战友从未从他那里收到过像1928年那样“亲切的”信函。

就重要性而言,在斯大林休假期间要办的事情当中,为进攻支持李可夫—布哈林集团的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作好准备是头等大事。斯大林1928年9月10日写信给莫洛托夫说:“在莫斯科积极分子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有一个‘错误’:决议中关于当前资本主义的‘改造时期’的那句话,本是联共(布)代表团从布哈林的最初提纲中删掉的(经布哈林同意),如今却在莫斯科积极分子的决议中出现。干嘛要这样做?难道这是执行代表大会和联共代表团的决议吗?”斯大林策划了一个在“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掩饰下反对首都党组织的阴谋,为此,他提出把关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提交给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目的是在会上揭露“某些积极分子的某些错误”。虽然同莫斯科的领导人的斗争是按另一个脚本开始的,斯大林的信仍然表明他打算立即铲除莫斯科的领导人。同时,斯大林喜欢采取看起来不是进攻而是防守的行动方式,故意作出对莫斯科市党委书记H. A. 乌格拉诺夫的客观公正的姿态。斯大林1928年9月26日写信给米高扬说:“等到莫斯科之后我们再谈乌格拉诺夫的事情。遗憾的是,他是一个在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上不可救药的糊涂人。可惜,非常可惜。”¹⁹

撤换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的行动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莫洛托夫筹划和实施的。莫洛托夫在9月14日,也就是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结束一天之后,写信给斯大林说:“乌格拉诺夫是主要问题。对他的所作所为多一天也不能忍受了。”²⁰莫洛托夫的信表明,他决定利用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文件作为向莫斯科的领导人发起攻击的借口,在这些文件中强调的是困难,只字未提“右倾”。通过莫洛托夫的努力,在《真理报》上登载了谴责莫斯科全体会议文件的文章。

尽管布哈林仍然是《真理报》的责任编辑,但是来到《真理报》的斯大林的“政治委员们”——M. A. 萨韦利耶夫、Г. И. 克鲁敏和 E. M. 雅罗斯拉夫斯基将报纸重点转向了斥责“右倾”。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谁是“右倾分子”,但对于越来越多的党的工作人员来说所指何人是清楚的。布哈林1928年9月底动身休假时,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共产国际在同右倾作斗争》一文中的观点,该文为从国际事务转向国内事务架设了桥梁:“在关于联共的问题中只字不提与中农结盟,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右倾(对群众的需要不闻不问的官僚主义,一些机构环节的官僚主义蜕化趋势即失去对群众最基本需要的辨别能力并且把政策简单化为单纯的行政命令等)。关于阶级斗争激化的问题表述得极端含糊(同谁进行阶级斗争?同中农或者不是中农?)。”²¹布哈林在论敌的压力下作了让步,承认存在“右倾”,他试图对“右倾”给予自己的、反官僚主义的解释,但没有能够制止由莫洛托夫亲自督战的宣传运动。

与此同时进行了下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控制数字的准备工作,这些数字必须得到定于11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例行全体会议的批准。经济政策的前景,特别是在紧急粮食收购的极其有害的尝试之后,要求最严肃地考虑现实的条件和能力。但是在斯大林领导班子的正在形成的关系体系中,讨论官方政策的缺陷和其负面结果是不可能的。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为迎接新的经济年度而作》一文1928年9月30日在《真理报》上的发表,是H. И. 布哈林把所有这些问题提交讨论的尝试。这篇文章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一系列出版物上发表,为当代读者所熟知,因此我们只需简要介绍一下其内容和意义。《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对关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激烈争论的公开反映。还有一点不能忘记,札记的发表是在报刊上对斯大林政策的最后一次公开批评。虽然没有点名,但文章说的是“我们的”经济政策的错误和缺点,所以大家都清楚批评是针对谁的(请注意,对斯大林政策的批评是与对托洛茨基派“超工业化”的批评交汇在一起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的声明《七月

全会和右倾危险》的回答²²)。

对 1928 年秋由于“非常措施”而在国内形成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具体分析,揭示了新经济政策的最主要基础即城乡间经济关系遭到破坏、向国家供应工农业产品方面出现的商品奇缺现象以及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蜕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忽视客观能力(“薄弱环节”)的唯意志论造成了不正常的局面,这种情况有引起最严重的失败、包括工业化在内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以及居民面临灾难和饥饿的危险。布哈林指出,在农业中,特别是在粮食生产上形成了反常的局面,从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一开始,商品粮甚至在总产量下降的情况下也出现增长:1925—1926 年度粮食产量增长 32.4%,商品粮增长 30.8%,1926—1927 年度则分别增长 3.85% 和 10.2%,1927—1928 年度在总产量减少 1.9% 的情况下商品粮增长了 6.8%。布哈林补充说明,关于粮食产量在 1927—1928 年度下降的数据不完整,——“……实际上减产的幅度还要大”²³。布哈林断言,在公认农民没有“无形储备”的情况下,产量下降必然导致“实物化趋势的增强”。

正如该文所指出的那样,粮食收购危机的产生不仅是由于客观原因(生产下降、农民的农业劳动收入增加等),而且是由于“不正确的价格政策”——“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严重脱节”,这对农民的生产利益产生了显著影响。布哈林认为北高加索地区是不正确的价格政策的“极端明显的例子”,那里在丰收的 1925—1926 年度收购部门每普特小麦支付 1 卢布 15 戈比,可在歉收的 1926—1927 年度和 1927—1928 年度每普特支付 1 卢布 2 戈比。结果农民在 1925—1926 年度 1 俄亩地(1.09 公顷)的小麦卖了 72 卢布,1926—1927 年度卖了 32 卢布,而在 1927—1928 年度只卖了 24 卢布。布哈林写道:“即便假设这些数据不十分准确,但它们毕竟相当清晰地说明了一种明显的趋势。”²⁴我们重提该文作者对所援引数据的准确性所作的保留说明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数据实际是斯大林对《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批评的唯一论据。

正如布哈林所指出的那样,工业和建设中的唯意志论计划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工业化进程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例如,任务的“不协调”在基本建设中造成了工厂需要用“明天”制成的砖和金属构件来搞“今天”的建设的局面²⁵。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布哈林根本没有提出回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新经济政策上去。《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阐述了通过工业化改造国民经济的构想,即保留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各主要经济部门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和依托农业的全面增长。正是在多种成分经济的条件下才能够建成新的经济关系体

系,这一体系“要求把个人的、群体的、大众的、社会的和国家的主动性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诚然,这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变得更文明并且学会更好地管理”,如果我们不容许“官僚主义的蜕化”……²⁶)

10月8日,政治局在布哈林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文章的一系列论点存有争议,《真理报》不应该未经中央委员会许可就予以发表²⁷。这个决定以及报刊上发表的没有点布哈林的名但对他的文章大张挞伐的文字,成为斯大林的追随者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对布哈林展开严厉批评运动的信号。这些表面上没有得到批准、“根据来自下面的倡议”进行的严厉批评,是诋毁“右派”和逐渐准备对他们发起更加猛烈进攻的主要手段之一。

但这并不表明,斯大林不曾准备亲自回答布哈林的文章。在前不久解密(虽然仍没有完全解密)的斯大林个人档案中发现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对布哈林同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的批评意见》的手稿……同布哈林的文章一样,斯大林的回答的第一部分也是概括地提出主题,然后应该是若干个进行更具体分析的部分(在布哈林的文章中是第2和第3部分)。从保存下来的手稿和打字副本可以推断,第一部分是斯大林在《……札记》刊出后立即写就的,而且没费力气,因为第一部分的内容无非是进行政治指责。在第一部分正文后面的罗马数字Ⅱ证明他是打算继续写下去的²⁸。尽管斯大林声称“……政治局不可能对布哈林同志的文章不闻不问”²⁹,但他最终也没有作出对经济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回答,这是斯大林所力不能及的。尽管如此,文章写就的部分仍值得关注,因为它不仅体现了斯大林典型的论战方式,而且证明了中央十一月全会前夕和此次全会上党的领导层内的情况。

斯大林在回答的开头声称,《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在党内引起了困惑,因为该文先是表现了“对党的现行方针的不满”,其次,表达了“通过公开争论‘纠正’这一方针的想法”。斯大林认为,在布哈林的这两大“错误”当中,“尤为危险的是在我们中间进行公开争论”³⁰。也许布哈林的确曾试图发起公开争论*,这种争论在布尔什维主义前不久的历史中还很普遍,它能够在没有私人“争斗”和迫害的情况下,制定“总路线”。但在左派反对派被开除出党之后,党的领导层

* E. A.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是这样看的,他寄来了一篇内容丰富文章《一个经济学家关于〈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札记》,该文自然没有得到发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71号目录,108号案卷,第4—17张)。

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改变。党内的争论,尤其是公开争论,从这时起永远停止了。

斯大林称“《真理报》刊登布哈林同志的文章是一大错误”,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地方负责人员由于不了解布哈林同志的文章的发表背景而会陷入混乱状态。除现有的困难之外,政治局对这篇文章保持缄默又产生了新的困难”³¹。遗憾的是,我们也不清楚《真理报》主编布哈林的文章的“发表背景”,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前高层领导人就新的经济年度的远景进行了又一次交锋。还应当指出的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内容与写于七月全会前夕并在“七人小组”会面时引起明显冲突的决议草案《经济建设和党的任务》的内容颇为相似。在《经济建设……》的标题上方出现“札记”两字不是偶然的(见本文件集第2卷补充材料12)。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不仅是刊登一篇文章的事情,而且是对“紧急措施”的负面后果的分析的继续和扩展,是对斯大林领导班子的有意挑战。

斯大林的《对……批评意见》一文写就的部分不仅充满愤怒之情,而且肆意歪曲,把莫须有的东西硬加在他所分析的文章中。《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遭到批评是因为“折衷主义”和“不认真对待数字”。例如,说布哈林文章的“折衷主义”表现在支持“把重心转到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工业化方针,表现在“作者过分绝望地描述了我国的财政状况……并且给基本建设和基本建设投资附加了许多限制(坚决加强轻工业,初步消除……建筑业的赤字,消灭国家预算的紧张状态等等),从而自然得出结论:降低工业现在的发展速度,关闭第聂伯河列宁水电站,停止斯维里工程,终止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不开始汽车厂的建设……”³²布哈林要求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办法来支持农民经济、促进农民经济的振兴和发展,这被说成是主张以“‘扩大再生产’为目的而加强农村的个体积累,而这种积累不可能不意味着富农收入最大限度地增加”³³。

“布哈林同志不认真对待数字”的证明是利用“不完全准确的数据”,如上所说,布哈林的文章对“数据不完全准确”预先作了说明,而且这与数据的初步性也有关系,因为经济年度还没有完全结束。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驳者没有一次引用过“准确的数据”。但是,斯大林的愤怒不是由数字本身引起的,而是由在这些数字基础上对生活现实的评价引起的。比如,关于布哈林对1927—1928年度粮食生产的进展(在总产量减少1.9%的情况下商品粮增长6.8%)的评价,他的回答是:“或者是1927—1928年度总产量的下降不符合事实,或者是这一数字是正确的,但那样一来表示商品粮产量增长的数字就是不正确的,或者这两个数